

明·凌濛初 著

初刻拍案惊奇_上



明·凌濛初 著

初刻拍案惊奇
下



封面设计 施嘉彬

书号：10368·99

定价：上、下册4.40元

明·凌濛初 著

初刻拍案惊奇 上

海峡文艺出版社

明·凌濛初 著

初刻拍案惊奇 下

海峡文艺出版社

初刻拍案惊奇

(上)

〔明〕 凌濛初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1,625印张 5插页 522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600

书号: 10368·99 定价: (上、下) 4.40元

初刻拍案惊奇

(下)

〔明〕 凌濛初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1,625印张 5插页 522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600

书号: 10368·99

定价: (上、下) 4.40元

明桂州刺史初凌公像



凌濛初像

PA732/5

前 言

《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向与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齐名，世称“三言二拍”。

“二拍”的作者凌濛初，生于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崇祯八年（1635），以副贡授上海县丞，以后又做过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因反对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呕血而死，死时年六十五。平生著作甚多，有《圣门传诗嫡家》十六卷（《附录》一卷）、《诗言异》六卷、《诗逆》四卷、《东坡禅喜集》十四卷、《诗经人物考》以及《左传合靖》等等，还写有戏曲《虬髯翁》、《颠倒姻缘》、《北红拂》、《乔合衫襟记》、《蓦忽因缘》等。而最有名、影响最大的，则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这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初刻拍案惊奇》是他四十八岁居南京时编撰的，刊于崇祯元年（1628），共四十卷。《二刻拍案惊奇》则刊于崇祯五年（1632），亦四十卷，但其中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与《初刻拍案惊奇》的卷二十三重复，卷四十《宋

公明闹元宵》则系杂剧，故两集实有小说七十八篇。

这七十八篇短篇小说，就其故事的素材来说，大多取自前人的说部（如《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笔记（如《西湖游览志余》）、戏曲等。有好几篇，作者甚至在故事中直接点明素材的来源，如“初刻”卷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公开点明本篇素材来自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的《秋千记》。有人对此作过统计：“初刻”四十篇，有源可寻者三十篇；“二刻”三十八篇，有源可寻者则达三十二篇，两集不明故事来源的十六篇。然而，尽管如此，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也仍然是凌濛初个人的创作集。这是因为，不仅约占全书四分之一、故事不明其源的作品，可能大多是属于作者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而加以想象虚构的，而且，即便是那些从前人说部、笔记、戏曲中撷取素材的作品，也都已是经过作者的再创作，较之原素材，无论是主题、意象构设、人物塑造，还是环境描写等等，或立意已不同，或面目已全非，均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篇幅的长短，有的素材在原书中不过廖廖数十字，到他手中，则成为一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小说作品了。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二拍”的创作，是他“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叙胸中磊块。”（《二刻拍案惊奇·小引》）所谓“演而成说”，也就是再创作。

宋元话本小说，以当时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特别是市民阶层的生活，使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二拍”的作者继承了宋元话本小说的优良传统，在两集七十八个短篇中，触及到当时的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并颇具自己的特色，塑造了一些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新的人物形

象。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二拍”中的一些描写商人的作品，主人公不少是市民阶层中的商人，但正面描写商人经商活动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不过，它是颇具新的特色的。作者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对当时一些商人经商活动的成败得失、心理活动、乃至周围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态度的描写，生动而又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人这一阶层的生活、思想和愿望，塑造了新的文学形象，表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初刻”卷之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和“二刻”卷之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这两个短篇，就是这样的作品。前者描写一个“百做百不着”、屡遭失败的“倒运”商人文若虚，怎样搭乘朋友专门走海泛货的商船到海外，偶贩洞庭橘和带回大鼋壳而骤发大财，由“倒运”商人而“转运”成为巨富；后者则描写一个连亏血本而流落他乡的商人程宰，在“海神”的帮助指点下，通过囤积居奇的剥削手段，终于发财致富，衣锦还乡。作者生动而又细腻地描写他们发财致富的全过程，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人们希望通过新的剥削手段和途径，以获得财富的愿望，体现了明末市民阶层中商人的新的变化和新特点。如果说，“三言”中所描写的那些以商业活动为主的市民，还大多是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去成家立业的话，那么，这两个短篇的人物，则纯属想通过海外贸易和囤积居奇而发财致富。这种新的特点，不但反映了市民阶层中商人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而且也反映了明末社会经济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二拍”中，无论是那些正面描写还是间接描写商人的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经商，这在封建社会中，是被目为“贱业”的。到了这时，不但不看作是“贱

业”，而且还被人们视为正当的“善业”，特别是在一些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甚至还被人们当作“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因为“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二刻”卷之三十七）以“利息多少为重轻”，不仅成为商人的生活准则，而且，已扩及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习俗和风气，这种社会风气的新变化，正是这时期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反映。“二拍”中关于这些方面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因此，尽管此类作品的商人形象，如文若虚、程宰者流，不是我们今天读者所要仿效的对象，但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塑造了新的艺术形象，所以，这些作品，无论是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当时的社会也好，还是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也好，都具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

占居“二拍”全书最大比重的，仍然是有关男女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在此类作品中的一些较优秀的篇章里，作者通过男女青年的种种曲折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了他们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大胆地肯定了他们为追求自由幸福的自由结合，表达了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要求突破封建伦理道德藩篱，按照自己的理想安排生活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反映了他们有别于封建主义的，要求男女平等的新的贞节观念。

歌颂青年男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主题，也产生过大量优秀的作品。“二拍”中也有这样一些作品，例如“初刻”卷之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描写兴娘对崔生的真挚爱情，也还很动人，但死后借妹体团聚，终涉鬼魂，在构思上毕竟与过去此类作品大同小异。“初刻”卷之

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写一对色目人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不无特色，但男女主人公的团聚，虽非借助于鬼魂，却仍然还是死后复活。此类作品，写得最有特色的，还是“初刻”卷之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这一篇。作品写的是赵宋宗室赵不敏与钱塘名妓苏盼盼的真挚爱情。赵在功名未成时，在苏盼盼的真诚帮助下，终于科第高捷，取得功名，除授襄阳司户。赵赴任后，虽与苏盼盼分居两地，但终不负心。他曾多方托人为苏盼盼脱籍，却一直未能如愿，最后竟至一别三年。由于互相思念和深笃的爱情，而一在襄阳、一在钱塘同日而死。死前赵不敏还不负苏盼盼之托，为其妹苏小娟慎择配偶，成其美事。赵不敏与苏盼盼的爱情虽以悲剧告终，但他们之间这种“死生心似石”的深挚的爱情，却洋溢纸上，十分感人。特别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表现他们之间的真挚爱情时，并没有采取象许多作品所写的那样——生前不能结合，死后还来相聚的非现实情节，因而，就特别使人感到亲切和真实。

在封建社会中，任何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自由结合，都被认定为“非法”的。这种封建婚姻制度，不知制造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悲剧，吞噬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幸福和生命！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这是封建社会中广大青年男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反映这种要求，作者写了许多“非法结合”，并给予正面的肯定和赞扬。例如，“初刻”卷之二十九《通闺闱坚心灯火，闹囍图捷报旗铃》的罗惜惜和张幼谦、“二刻”卷之六《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中的刘翠翠和金定，他们都是从小学同学相爱，尽管门不当，户不对，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媒妁之言，但他们为了争取自身的幸福和爱情，大胆地自由结合了。当她们的父母进行阻挠时，她们表示：今若不依我，我只是死了，决不去嫁人的！最后，终于逼使封建家长不得不同意和承

认他们的“非法结合”。如果说，罗惜惜和张幼谦、刘翠翠和金定的自由结合，最终毕竟还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和“承认”，那么，“二刻”卷之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闻蜚娥和杜子中的结合，则可以说完全是她自己进行挑选和做主了。闻蜚娥因生在一个武官人家，必得个子弟在黉门出入，才能结交斯文士夫，不受人欺侮，她的弟弟又小，所以一向装做男子，到学堂读书。在学堂中，她和同学杜子中、魏撰之结下深厚的友谊，意气相投，因此，她就“有意要在两个里头拣一个嫁他”。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又经过了一番共患难的曲折过程，她终于自主地称心如意地挑上杜子中，得到了美满的结合，并为他们的好友魏撰之成就了婚姻美事。闻蜚娥的父亲对于女儿的自主选择 and 自由结合既没有从中插手阻挠设障，也没有加以任何非议，而且还欣然表示同意。在这个优秀的短篇中，作者以鲜明的态度，对闻蜚娥的大胆自主行动，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扬，认为她是“世上堪称女丈夫”，这不能不是作者一种比较进步的观点的体现，也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广大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

封建社会是一个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的社会，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封建婚姻制度，则是夫权的最直接体现。在这个制度下，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则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所谓“贞节”，只是对妇女而言，男女之间，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它是封建阶级强加在广大妇女身上的桎梏。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要求在所谓“贞节”问题上男女对等，希望突破封建“贞节”的羁绊的呼声也最强烈。作者反映了这种要求，他在“二刻”卷之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随，焦文姬生仇死报》这个短篇的开头，针对着“贞节”上的男女不平等，愤慨地写道：“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

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皆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姑娘们心里的所在。”正是从这个进步观点出发，他在这个短篇中，深切地同情焦文姬的不幸遭遇，无情地揭露和鞭挞满少卿薄幸负心的卑劣灵魂，指出：“虽然自古皆有死”，但满少卿因为薄幸负心而最终受到的惩罚，却是“死得不好看”。这个短篇的故事情节固然与“王魁负桂英”大抵相似，但作者显然不是把它看成是一般负心汉的故事来写的，而是透过焦文姬的婚姻悲剧，看到了婚姻、贞节问题上男女的不平等，从而赋予了它新的思想意义。作者在“贞节”问题上所体现的这种进步观点，我们还可以从“二拍”中涉及“失节妇”的几个短篇中看到，例如，“二刻”卷之二十五《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的郑蕊珠，“初刻”卷之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姚滴珠，以及“初刻”卷之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的巫娘子，都是所谓的“失节妇”，她们都是在邪恶势力的逼迫下“失节”的，但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阶级看来，终究还是“行不得的事”。可是，作者非但没有指责她们，而且竭力肯定她们的丈夫并没有因她们“失节”而嫌弃她们。当知县误将容貌与姚滴珠相象的郑月娥判与潘甲为妻时，潘甲坚决不肯，并说：“小人争讼，只要争小人的妻，不曾要别人的妻。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小人也不好要得，老爷也不好强小人要得。若必要小人将假作真，小人情愿不要妻子了。”坚决要回“失了节”的妻

子姚滴珠。巫娘子把自己遭卜良污辱的事告知丈夫贾秀才后想自杀，贾秀才却说：“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不同于封建主义的“贞节”观念，是比较进步的。

除了描写商人和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以外，“二拍”中还有不少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或揭露和抨击贪官污吏，暴露他们贪赃枉法，残害无辜；或描写骗子拐子巧设骗局，坑害善良；或暴露流氓恶棍，如何教唆词讼，淫人妻女，残害人民……所有这些邪恶势力，相互勾结，把他们罪恶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阴森森的黑暗统治网，使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的黑暗之中。

官贪吏酷，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特别是作者所生活的明代后期，封建官僚贪赃腐败成风，恣意榨取民脂民膏，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作者首先把他的笔锋，指向贪官污吏，给予深刻揭露和强烈谴责。他指出，这些贪官污吏，他们的做官哲学就是：“……做了官，怕少钱财？而今那个做官的家里，不是千万百万，连地皮多卷了归家的？”（“初刻”卷之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艚》）。“二刻”卷之一《进香客弄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的柳太守，就是这样的典型。还未上任，听说太湖洞庭山某寺珍藏的白居易手书《金刚经》价值千金，“他虽不好古董，却是个极贪的性子，见说了值千金，便也动了火，牢牢记在心上。”到任后，他就别出心裁，不但“借此为题”，勒索了好几家的银子，成为他“发科分起发人的丹头”，而且，竟至不惜串通劫盗，构设罪名，诬陷该寺住持，强索这价值千金的《金刚经》。其手段之阴险卑劣，较之劫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刻”卷之二十《贾廉访膺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中的贾廉访，竟不惜欺孤骗寡，骗取和霸占亲家翁的

万金家财。无怪乎作者气愤地指出：这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正似“官人与贼不争多”（差不多），“做官却做贼了。”“二刻”卷之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则刻划了一个“又贪又酷”、“凶暴残忍”的杨巡道和一个“赋性阴险”，“每事苛刻取利”的张康生，如何相互勾结，一欲坐收渔利，贪赃枉法甚至杀人灭口，残害五条生命，一欲图谋霸占遗产。……总之，官贪吏酷，横行无忌，暗无天日。作者指出：“……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初刻”卷之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尽管作者只就一小部分的贪官而言，但他指出“官”即“盗”这一事实，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封建官吏的本质的。

作者在揭露贪官污吏的同时，还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骗子拐子、流氓恶棍的横行：有专以炼丹烧银行骗的“道士”，如“初刻”卷之十八《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有丧心病狂，专以自己的妻子为诱饵的骗子，如“初刻”卷之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的张溜儿；有专以拐卖良家妇女为职业的拐子，如“初刻”卷之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的汪锡和王婆；还有合伙设局行骗的王朝议、李三、郑十等流氓恶棍（“二刻”卷之八《沈将士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以及教唆词讼进行讹诈的牛三、周丙等“赵五虎”（“二刻”卷之十《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品所写到的这形形色色骗